

谈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

齐世荣

不久以前,北京史学界的一些同志曾就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主张今后不要再采用这种提法,以免产生种种流弊;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并无根本性的错误,仍能成立。我认为,历史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作为一个口号,我们最好采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之类的提法,去掉“政治”二字,以免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历史科学应当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本文不打算对口号本身做更多的讨论,仅想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试作一些分析。以下谈四点意见,向同志们请教。

一块试金石——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结合

历史学从来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例如,封建史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就在于为宋王朝提供统治经验,求得长治久安的办法。资产阶级史学家中有的人不隐讳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如西利(J. R. Seeley, 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有的人虽然标榜“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的各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毛泽东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②以上两段话说的都是哲学,但其中所讲的基本道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也是适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剥削阶级的历史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二者在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剥削阶级的历史家由于具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往往歪曲社会的历史(不等于说都无真知灼见);而无产阶级的历史家由于是为无产阶级这个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服务的,他们根本不需要歪曲社会的历史,而恰恰相反需要揭示历史的真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把革命性与科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革命性是建筑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列宁讲过这样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这个理论(指马克思主义——笔者)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

* 本文是作者根据1979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

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③

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这是一块试金石。凡是在历史研究中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的人，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才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反之，凡是肆意践踏这个原则的人，不论他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类的口号喊得多响，如果不是“四人帮”之流的无产阶级的敌人，至少也是历史科学的破坏者。还有一种人，他们不反对上述的原则，但在研究过程中又往往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割裂开来，以为科学性是从属于革命性的，为了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可以有选择地对史料作些“剪裁”的工作，牺牲一下科学性也无妨。下面我想分别就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试作一些分析。

影射史学的流毒必须继续清除

在文化革命中，“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之类的提法曾经风靡一时。叛徒张春桥还说过：“讲历史都是讲现在，都是为解决现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论调似是而非，使不少人上当受骗，流毒至今有待于进一步清除。

“立足现实，追溯历史”，是影射史学对于自身的绝妙写照。所谓“立足现实”，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所谓“追溯历史”，就是按照这种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去歪曲、篡改历史。影射史学的文章一律是先有结论，后凑材料。材料有时有几条，但往往是被曲解的；有时是孤证；有时连孤证也没有，便干脆捏造出来。按照这种办法炮制出来的文章，当然只有反革命的政治性，而毫无科学性。正是由于毫无科学性，一当炮制者的政治地位丧失以后，它们也随即失掉存在的价值，此后只能被送往废品收购站，或起点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外国，为了某种反动政治的需要来伪造历史的例子，也是常见的。例如，十九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西利，就是一个殖民主义的狂热的辩护士。他主张历史学要与实际政治发生关系。为了替英帝国奴役印度的罪行进行辩护，他硬说一八五七年印度士兵的起义是被印度人民消极对待的。^④又如，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一些御用史学家便纷纷编造他的历史“功勋”。关于赫鲁晓夫的初期活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资料只提到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后来却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越提越早，硬说他在一九一七年初已经是乌克兰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却避而不谈他入党的时间还在一年以后。苏联国内战争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才被高加索战线第九集团军政治部任命为指导员，但苏联的某些历史著作竟把这样一个低级的政治工作人员和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等人并列，极大地拔高了赫鲁晓夫的历史地位。^⑤

“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但是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仍然有待肃清。我看到有些批判影射史学的文章，虽然出自良好的动机，但使用的方法仍然是实用主义的。例如，为了“对着干”，有的文章把吕后描写为一个极坏的女人，甚至说她毒死赵王如意的结果，使汉高祖的政治路线后继无人。根据是什么呢？不过一条史料，就是刘邦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意类我”。^⑥“如意类我”，只是一个孤证，而且就是这个孤证也不能解释为如意是刘邦的政治路线继承人的意思，除非还能找到其他一些史料，可以证明如意的政治主张确实和刘邦一样。但这是找不到的。江

青为了想当女皇，极力吹捧吕后，把吕后作为自己的化身，对此当然应当予以揭露和批判。但我们也不应反转过来把历史上的吕后按照叛徒江青的反动面目来塑造。吕后就是吕后，她既不是“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也非“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像上面所举的例子，虽然为数极少，但其存在本身却说明了影射史学的流毒尚未肃清。我们要想使历史科学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对影射史学展开批判。

历史研究要与现行政策的宣传有所区别

有一些作者，他们认为历史研究要加强革命性，发挥战斗作用，就必须与本国现行的各项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现行政策的口径来写历史。这些作者虽然不是故意歪曲、篡改历史，但往往对史实不忠实或不够忠实，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种倾向，苏联史学界从二、三十年代起就已经存在，对我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我认为，一定要把历史科学的研究与现行政策的宣传区别开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造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小平同志这里所讲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个基本道理，对于历史研究工作也是适用的，或者可以说是更为适合的。历史科学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是通过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不是也不应当是某项现行政策的历史注解。具体的政策总是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根据实践的检验而有所补充和修正。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在彼时彼地是正确的东西，在此时此地可能变为不正确的东西。历史研究如果总要和现行政策去对口径，那就必然要把研究的结论变来变去，从而失去科学的价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一项决议中批判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错误，正确地指出：“这一学派歪曲地解释历史事实，并且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用今天的观点而不是根据产生历史事件的条件来说明历史事实，因而歪曲了历史真相。”^⑦

下面我想举出一些例子，看一看把历史研究同政策宣传混同起来所造成的危害。

第一个例子：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史学家的著作中，都把英帝国主义看作武装干涉苏俄的主角。这是符合历史真相的。斯大林说：“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英国资产阶级进攻苏联，企图建立‘十四国联盟’”。^⑧斯大林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说“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当然是正确的。但说“将来”还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就未免主观臆测了。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苏联也曾把反美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史学家便从当时的政策需要出发，把当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主角说成是美国，而不再是英国。军事史家纳伊达说，美帝国主义是“〔苏俄〕外来的和内部的反革命的一切力量的主要贷款人，是协约国的一切战役和一切最主要的反苏阴谋的首倡者”。^⑨美帝国主义无疑犯了干涉苏俄的罪行，但如果把它的作用夸大为“协约国的一切战役和一切最主要的反苏阴谋的首倡者”，那就不符合历史真相了。纳伊达的著作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缺乏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

性，因而它的思想性也就不能不受到削弱。

现在再看另一个例子：苏联史学界对少数民族领袖沙米尔和赫麦尔尼茨基的不同评价。

沙米尔是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教穆里德教派的宗教和军事领袖。从一八三四到一八五九年，他领导了故乡人民反对沙俄兼并的斗争。在一九五〇年以前，大多数苏联历史学家都把他看作反对沙俄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战士，潘克拉托娃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苏联通史》一书中说：“沙米尔的活动在这一时期不仅针对着沙皇制度，而且针对着地方封建领主，因此具有民主的、进步的性质。”^⑩继潘克拉托娃之后，古谢诺夫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了《十九世纪阿塞拜疆社会政治思想史片断》。这本同样肯定沙米尔的著作，受到了赞扬，并被作家协会推荐为斯大林奖金的得奖著作。

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和史学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沙米尔的评价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真理报》刊登了一项公告，宣布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承认它以前推荐古谢诺夫的书为得奖著作是“错误的”，并宣布它已经请求部长会议撤消把斯大林奖金授予古谢诺夫的决定。公告说，沙米尔所领导的运动“是一个反动的和民族主义的、为英国资本主义和土耳其苏丹服务的运动”。接着，当时担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巴吉罗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⑪指责沙米尔从一开始就勾结土耳其，为它的利益服务。巴吉罗夫认为高加索人民之并入俄罗斯，是“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使他们“获得了保障，可以免受外部敌人的侵略”，还“推动了高加索各族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斯大林逝世后，巴吉罗夫被当作贝利亚的同伙逮捕了。一九五六年一月，《历史问题》杂志召开读者会议，副主编布尔札洛夫认为苏联史学家必须纠正过去几年的伪造和夸大失实之处，其中也包括对沙米尔的评价。他把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歪曲都归咎于巴吉罗夫的那篇文章。此后，又出现了一些肯定沙米尔的文章。例如皮克曼的《论高加索山民对沙皇殖民者的斗争》一文，发表在《历史问题》一九五六年第三期上。

但是不久，对沙米尔的评价又由肯定转向否定。《历史问题》在编辑部改组后，于一九五七年第三期发表了题为《在历史科学中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的社论，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批判，对重新评价沙米尔的问题自然也给予了谴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苏联史学界对沙米尔基本上是否定的。

· 总之，对沙米尔的评价前前后后多次反复，但最终是予以否定。苏联史学家之所以要否定沙米尔，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俄罗斯沙文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度赞扬高加索山民的抗俄斗争的。马克思指出：“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势，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辉的胜利”。^⑫恩格斯也指出：“高加索的斗争是给山地居民带来最大荣誉的一次山地战”。^⑬

与否定沙米尔恰成对照的，是对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的肯定。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是十七世纪乌克兰的一个统领。一六五四年，他在彼列雅斯拉夫会议上请求莫斯科国保护，以对抗波兰。早在一九三七年，苏联政府为悬赏征求优良的中学三、四年级苏联历史教科书而特设的评定委员会就在其决议中指出，对赫麦尔尼茨基反对地主的波兰和苏丹的土耳其占领乌克兰的斗争，应肯定其积极作用。决议认为，摆在乌克兰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被地主的波兰和君主的土耳其所并吞，或者转到俄罗斯的政权之下。……第二个前途终究是害处较小的。”^⑭这种“害处较小”的提法后来被认为过于消极，不再采用。一九五四年，苏共中央发表了《乌克

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宣传提纲》，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极力予以抬高。《提纲》说：“乌克兰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兄弟的俄罗斯人民永久联结在一起，就使自己摆脱了外国的奴役，保证了自己的民族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合并大大有助于俄罗斯国家的巩固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制、农奴主、资本家以及外国侵略者——的协力斗争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人民的友谊增长并加强了。”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究应如何全面评价，我们姑且不论。单就《提纲》的立论来看，在上面短短的一段引文中，作者的自相矛盾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如果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合并大大有助于俄罗斯国家的巩固这一条确能成立的话，那么重新合并又有利于两个民族的劳动人民进行反抗沙皇制度等共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另外一条理由，如何同时也能够成立呢？当时的俄罗斯国家难道不是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压迫农奴的工具吗？这样的国家机器加强了，怎么反而更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呢？反之，如果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加强了，沙皇俄国的巩固程度就一定会受到削弱。二者必居其一，脚踩两只船是不行的。再有，苏联史学家一再强调的沙皇俄国的兼并一律促进了被兼并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一点，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对俄国的民族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他们就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⑤列宁还明确指出，乌克兰是“俄国沙皇和资本家的占领地。”^⑥信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苏联历史学家完全违背了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根据一种错误的民族政策的需要来歪曲过去的历史，把沙皇俄国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⑦竟美化为他们共享幸福的天堂。这类文章既然没有科学性，那么无论其作者如何装点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是不可能有半点“革命性”的。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现代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苏联史学界大约从三十年代末起，对现代政治人物的评价常犯绝对化的毛病。当某人居于高位，被看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时，对他的过去历史就尽量美化，只谈其功绩而掩饰其错误；当某人后来犯了严重错误，或背叛了革命，则对他的过去历史就只揭露其过错而抹杀其贡献。于是，就出现了两类人物：一类体现“绝对的善”；另一类体现“绝对的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总的说来是一部好书，但对人物的评价时有绝对化的毛病。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的功绩是主要的，但并不是任何错误也未犯过的。斯大林本人就曾经讲过他在列宁发表《四月提纲》以前所犯的错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在推翻沙皇制度后形成的新条件下，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个不彻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苏维埃在和约的具体问题上认清临时政府的真正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使苏维埃离开临时政府。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⑧可是，《简明教程》却说：“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所

回来——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协同党内大多数同志，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并号召群众进行积极争取和平的斗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①⑨}这种说法显然是和斯大林本人的论述不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把个人神化的，不论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列宁说得好：“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②⑩}有志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当牢记住列宁的这些名言。把伟大人物神化，不仅是违背历史真相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还会产生这样的不良后果，即当被神化的人物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一旦被发现时，在原先的崇拜者中间就会有一些人始则大吃一惊，继而悲观失望。

对于那些曾经参加革命但后来背叛了革命的人物，苏联史学界流行过一种全盘否定的简单化的处理办法。例如对布哈林等人，在许多著作中都把他们描写为从始至终一直干反革命勾当的人物，但我们都知道，列宁虽然后来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叛徒，但并不否认他们早期对革命所作过的贡献。对于布哈林，列宁也曾多次指出过他的严重错误，但并不是一笔抹杀的。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党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作了如下的评价：“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贵重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②⑪}

苏联史学家对于那些后来背叛了革命的人物，还一般不再提他们当年在党和政府中曾经担任过的重要职务，大概是怕这样写，会影响著作的“思想性”吧。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我国封建史学家欧阳修在答辩他写五代史为什么不伪梁的问题时，颇有见识地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接着，他举了《春秋》一书对于鲁桓公等四个篡位的君主都不绝其为君的例子，说明《春秋》之旨绝非奖篡。“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②⑫}“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封建史学家欧阳修都能有这样的见解，我们无产阶级史学家更应当敢于根据事实，进行褒贬。一些反面人物，如果不曾担任过重要职务，如何能起那么大的破坏作用呢？

以上这些错误作法，在我国史学界也有反映。例如对陈独秀的评价，在一段时间内，许多文章都只谈他的错误和罪行，而根本不提他在建党初期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历史事实采取分析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深刻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②⑬}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人是会变的。考茨基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有威信的大理论家，而后来竟堕落为死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杨度曾经参加“筹安会”，是复辟帝制的人物，而在晚年竟脱胎换骨，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即使有些一生反动的人物，也并非一句对话没有说过。周恩来同志曾经教导过我们，不要以人废言。历史事实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种办法表面上看来爱憎分明，“革命性”很强，

“政策性”很强，实际上只能培养形而上学的观点，造成人们思想的僵化，并不能真正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有益的教训。

从以上所举的几个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如果只照现行政策去“剪裁”历史而不顾其本来面目，那么无论某项政策是否正确，都会或多或少地违背历史的真相。即使某项政策是正确的，也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而如果政策本来就是错误的，那就会严重地歪曲历史。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研究不能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政策提供历史经验；也不是说，历史研究不能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去选择研究课题。这是另外性质的问题，我们在下面就要专门谈到。

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要有自己的特点

各门社会科学都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服务的方式则应当根据各门学科的特点而有所不同。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事情（其中一部分距离今天已很遥远），它不能像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那样直接地为无产阶级服务。如果生硬地、牵强地追求古今之间的直接联系，势必要把历史现代化。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两种错误的作法。借影射史学故意歪曲历史的人，和按照现行政策去“剪裁”历史的人，他们个人的政治动机和政治品质虽然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现代化，都是把历史作为推之于过去的现代政治，都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么，历史科学究应如何为无产阶级服务呢？

我以为，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问题应当从它的根本意义上去理解。这就是说，历史科学应当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应当有助于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斗争。具体地说，它的途径是：

首先通过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帮助无产阶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增强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无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是基于迷信，而是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得越清楚，就越能自觉地创造历史。当前，使我国青年一代通过学习历史认清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尤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由于“四人帮”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疯狂破坏，由于他们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在一些青年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制度似乎还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优越；马克思主义也似乎不灵了。对于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历史科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还需指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从总的趋势来看已经清楚，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具体规律，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有待阐明。

第二，历史科学应当通过总结人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的借鉴。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④这里，把历史知识的地位提得很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取得胜利的三个必备条件之一。这是因为，历史是不可割断的洪流，今天是由昨天演变而来的。要认识今天，就必须了解昨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必须与各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

历史经验只能借鉴，而不能生搬硬套。古今的历史条件不同，我们只能批判地吸取历史经验中合理的内核，结合今天的条件加以运用。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坚决反对上述种种把历史现代化的作法。因为把历史现代化，必然混淆古今历

史条件的区别，其结果不仅不能从昨天的经验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反而模糊了人们对今天的认识，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在影射史学霸占文坛的时候，“四人帮”把法家捧得比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要革命，要群众向之顶礼膜拜，使人们几有不知置身何世之感，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

历史工作者在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也应当考虑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今天我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历史工作者当然应当总结我国已经走过的道路，也总结其他先进国家已经走过的路，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用的经验。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历史研究的题目一律必须与现实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有些题目涉及的问题较小，但它是研究一个更大问题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些题目暂时看不出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在将来却可能发生作用；有些题目属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建设”范畴，或者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或者关于某件历史事实的必要考证；凡此种种，都是应当研究的。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道路是广阔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大一些，不可过于“急功切利”，随便给别人扣上“脱离政治”的帽子。

第三，历史科学应当培养人们观察问题的历史方法。斯大林有一句名言：“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转移。”^⑤他认为，“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⑥这种观点，不仅是历史工作者所应具备的，也是一切干部不可缺少的。有了这种观点，人们的思想就不会保守、僵化，就能在工作中有所发明、创造和革新。有了这种观点，人们看问题就会更深刻一些，不停留于事物的当时现象，而能找出它们的历史渊源，从发展过程中看出它们如何有了今天的存在，并在将来朝着什么趋向去演变。我觉得，历史科学在培养人们的历史观点方面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大有用处的。

* * *

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无产阶级历史工作者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恩格斯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⑦但是，任何人在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也不能不受到许多方面的限制。首先是时代的局限性。任何人都要受到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今天容易看出我们的前辈历史学家的时代局限性，我们的后辈也将如我们观察前人一样地看出我们的时代局限性。其次是民族的局限性。民族主义是一种常犯的错误，历史学家要能不囿于民族的偏见，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公正地对待其他民族的历史，并非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再有，作为一个阶级来看，无产阶级是没有阶级偏见的；但作为这个阶级的一员，以义愤代替科学，失掉科学冷静的时候，也是屡见不鲜的。此外，有些问题的史料浩如烟海，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尽览；而有些问题的史料又少得可怜，不足据以立论，这都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总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历史科学领域内，要“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⑧是不会有收获的。但是，“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⑨尽管有上述种种的局限性，我们只要力图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属于相对真理的范畴，从而构成绝对真理长河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抱负，我们也一定能够实现这样的抱负。

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61 页。
- ③ 《列宁选集》1972 年版第 1 卷，第 81 页。
- ④ 西利：《英国的扩张》，伦敦 1925 年版，第 268、271 页。
- ⑤ 参见《苏联国内战争史》，莫斯科 1960 年版，第 5 卷，第 380 页；《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50 页。
- ⑥ 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 ⑦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03—504 页。
- ⑧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292—293 页。
- ⑨ 纳伊达：《关于苏联国内战争史的某些问题》，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88 页。
- ⑩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莫斯科 1947 年版，第 2 卷，第 175 页。
- ⑪ 巴吉罗夫：《穆里德教派运动和沙米尔的性质问题》，载《布尔什维克》1950 年 7 月第 13 期。
-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65 页。
- ⑬ 同上书，第 12 卷，第 126 页。
- 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02 页。
- ⑮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19 页。
- ⑯ 《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39—40 页。
- ⑰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92 页。
- ⑱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289 页。
- 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 1949 年中文版，第 227 页。
- ⑳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92 页注①。
- ㉑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617 页。
- ㉒ 欧阳修：《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
- ㉓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892—893 页。
- ㉔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8 页。
- ㉕㉖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634 页。
- 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4 页。
- ㉘ 同上书，第 3 卷，第 129 页。
- ㉙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72 页。